

主 编：符华儿 詹尊沂
华世佳 林少敏

东方的 觉醒

(二)

海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的觉醒(二)/符华儿 詹尊沂 华世佳 林少敏 主编
(当代论丛/颜东主编)

ISBN 7-5634-1229-8

I 东… II 符… III 当代… 教育研究—中国—文选

IV .C632.D-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588 号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边市公园路 105 号邮编 133002)

海南省印刷工业公司印制

字数:34 万字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印数 1-1000 册 插页 4 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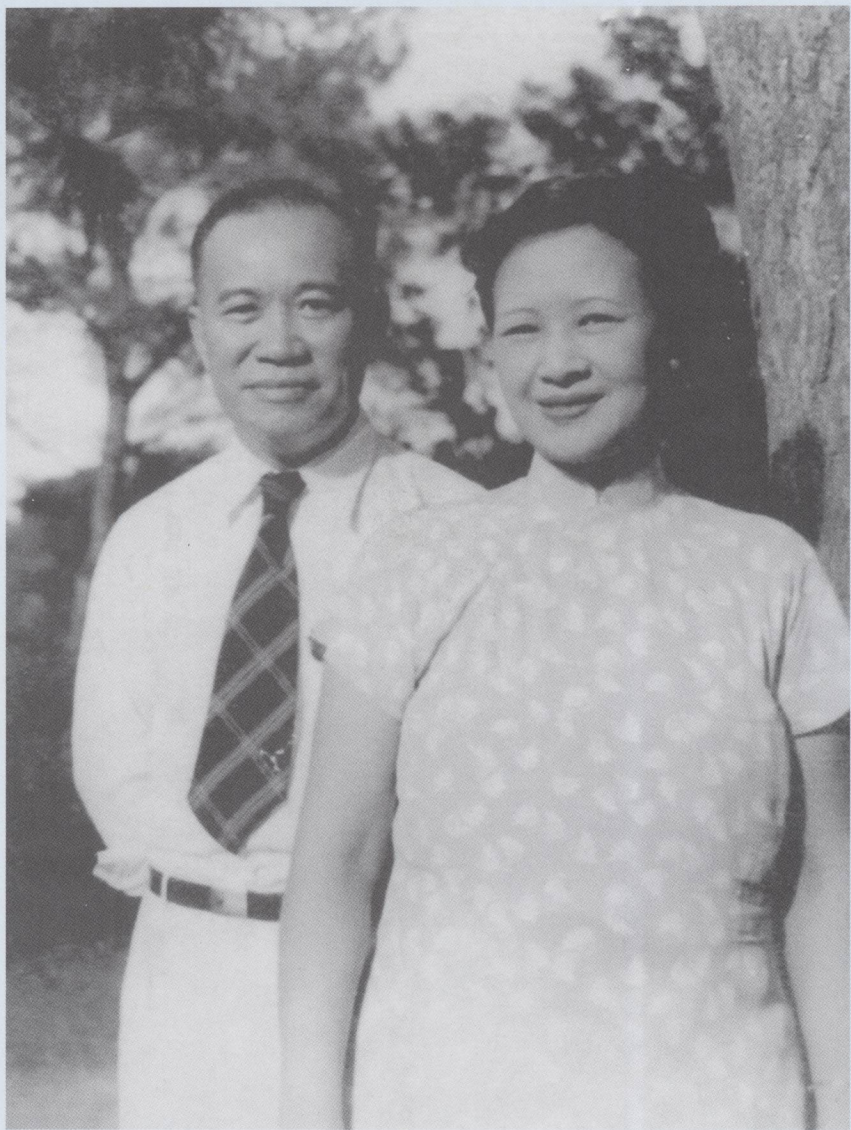
2000 年 8 月印刷《东方觉醒》

2007 年 2 月印刷《东方觉醒(二)》

定价:25.00



▲陈序经先生任岭南大学校长时留影



▲1949年8月20日，陈序经夫妇结婚20周年纪念照



▲2004年9月15日，中山大学举行陈序经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左起：余定邦教授、梁庆寅副校长、卢永根院士、李延葆书记、黄焕秋老校长、李萍副书记、陈其津教授）



▲2004年9月15日，中山大学黄焕秋老校长、李萍副书记为陈序经故居揭牌



▲在陈序经教授故居揭牌仪式上，中山大学梁庆寅副校长宣读牌文



◀陈序经教授故居全景（原为中山大学东北区17号，现为东北区319号。）



▲陈序经先生汉白玉塑像
(立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岭南堂校史室)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李延葆教授(右)和陈序经先生
儿子陈其津教授(左)在赠书仪式上



◀陈序经先生女儿陈穗仙
(右)向纪念会赠送陈序
经七十多年前收藏的岭
南大学钟荣光校长致函
及中山大学邹鲁校长致
聘函珍贵资料(原彩复
印)

▶陈序经先生女儿陈穗仙
(右)向纪念大会赠送陈
序经在中山大学任职时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标准
照





▲2003年11月8日，参加南开大学“纪念陈序经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教授、学者合影



◀ 2003年9月16日，暨南大学举行“纪念陈序经老校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现场

▶ 暨南大学“纪念陈序经老校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后，校领导蒋述卓书记、纪宗安副书记与陈序经先生子女合影



◀ 暨南大学“纪念陈序经老校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后，校领导与部分教授并陈序经家属合影

▶ 南开大学纪念会场外大厅展览陈序经有关生平照片及著作





▲1999年12月2-4日，在海南文昌市参加陈序经先生学术研讨会的专家、教授、学者合影



▲1999年12月2日，陈序经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在主席台中间就座的（自左起）：逢锦聚、陈家悦、陈玉益、林英、端木正、林诗奎、陆志远



▲2003年9月9日，陈序经故居（文昌）挂牌

序一

符华儿

陈序经先生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上的大师(端木正语),又是一位坚持精神独立、学术自由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以辛勤的汗水结下了累累的硕果,鸿篇巨制洋洋数百万言,深受人们的敬仰。

郁达夫先生云:“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在海南这块热土上,出现了陈序经这样的人物,海南人民应引以为荣和自豪,增强信心和勇气。

陈序经先生 1903 年 9 月出生于海南文昌清澜瑶岛村,父亲是一位爱国华侨小商。少年时代随父亲在南洋,亲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华桥,从小埋下了民族自尊、自强的种子。

1920 年 6 月陈序经入广州岭南中学读书。1922 年 6 月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就读,后转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从此与社会学结下不解之缘。1925 年 8 月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先后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1928 年回国在广州岭南大学任社会系助理教授。1929 年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基尔大学从事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他勤学苦练,刻苦攻关,掌握了英、德、法、拉丁等四国外语。1932 年至 1934 年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南开、清华、北大三校迁校长沙成立临时大学,1938 年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序经任该校法商学院院长。1944 年赴美讲学,主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主权论》。1946 年抗日战争胜利,回南开大学

任教务长兼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年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考察,为撰写《东南亚古史》作好资料的准备。解放后,历任岭南大学、暨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聘为一级教授。曾任第一、二届广东省政协常委和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文革”期间受到迫害,1967年2月16日,陈序经先生在南开大学因心脏病复发,含冤逝世,年仅64岁。1979年5月天津市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陈序经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

陈序经先生把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他主张教育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现代化;要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理科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拓宽专业基础,提高整体素质与水平;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措施加快人才的培养,强调通过留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他敏锐地察觉到把许多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势必影响到大学教育的前途;他极为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尊重人才,善于团结关心知识分子,最可称道的是诚恳;他还提出要保证教师和科研人员必要的从事专业技术研究时间,以保证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陈序经先生的教育思想对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调动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办好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有远见卓识的。

陈序经先生在搞好教学工作的同时,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凡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化学、经济学、民族学无不猎涉、精审,且多有创见。在研究中,敢于猎涉前人未涉及的学术领域,他中外文著作等身。其中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是《文化学系统》,共20册,每册平均10万字,最有争议的是“全盘西化论”。教育学有:《大学教育论文集》、《教育中国化和现代化》、《教育方针》。社会学有:《社会的起源》、《乡村建设运动》、《南洋与中国》、《暹罗与中国》。特别是晚年,仍呕心沥血,不遗余力,潜心于东南亚古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撰写了《东南亚古史研究》,填补了我

国东南亚古史和殖民研究的空白,成果卓著,影响深远。

陈序经先生生活在中华民族的苦难岁月里,忧国忧民,关切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他对当时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人“万事不如人”、“落后而望尘莫及”的状况提出要加快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凡是洋人在文化上能够成就的,中国人也能够做得到”。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民族自信心。他认为只有反对复古倒退,走出东方,向西方学习,中国才有振兴的希望,于是1933年12月29日,提出了“全盘西化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文化教育界的论战。他面对强敌的围攻,不改初衷,不后退一步,岿然不动。陈序经先生如果没有坚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博大精深的学术底蕴,没有久经论坛应战的毅力,是不可能笔枪纸弹,夺席谈经的。

陈序经先生始终坚持一个良知学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临大节不辱志,不委屈以求荣,不因为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稍减对祖国的热爱和理想信念。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赞誉莎士比亚说“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我们也可以说“陈序经是说不尽的”。

陈序经先生离开人世已经数十年了,但仍为人们深深怀念着,他的人品、文品的魅力是巨大的。

我们学习陈序经先生,举行一两次研讨会、纪念会是很不够的。作为学者,要像陈序经先生那样数十年如一日,鸡鸣即起,笔耕不息,做出成果。摆在我们面前要做的是要抓紧采集、整理陈序经先生的原始学术资料、手稿,分工合作撰编“陈序经文集”(选集)让后人研读,让陈序经先生的学术精神发扬光大,泽润千秋,让海南本土文化之花开得鲜艳!

我们更祈请海南省文化界领导,多关心海南本土文化事业,多干实事,带动海南的专家、学者,发挥专长,形成学习研究的新风,勇于创新,敢于猎涉前人所不涉及的学术领域,努力攀登科学高峰,为振兴海南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好的成绩。

序二

“苟利国家生死以”

——陈序经大师 40 年祭

云逢鹤

学术大师，现代名教育家陈序经先生离开我们已有四十年了。近半个世纪，主要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生产力大大发展了，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生活也有了空前的改善。改革开放是为了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争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也有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但更多的还是以西方的先进科学、先进技术、先进的管理对我们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造。在邓小平“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思想指引下，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人民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这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甚至生活时尚的追求也产生许多不以任何个人的喜恶为转移的重大变化。所有这一切使笔者不由得想不到先生在其文化学中对两种不同发展高度的“文化圈围”相互接触时产生的情况，所曾作过的理论分析，并由此感悟到先生七十多年前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提出“全盘西化”的良苦用心；感悟到先生学术思想的超前性及其前卫意义。在先生含愤弃世四十年后的今天，不能不再一次令人生发“哲人其萎”的锥心之痛。

先生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他在复旦大学攻读社会学，毕业后，先后赴美、德两国留学，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通晓英、德、法及拉丁语言，担任过我国多所著名大学的教授及领导职务，

对办学作过出色贡献,而所致力学术研究则毕其一生,未稍懈怠,“凡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民族学,无不精通,且每多独到之处。即使不赞同先生见解者,也钦佩其功力深厚态度谦诚”。^[1]先生治学严谨,尤结合国情,注重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志在为百余年来积弱贫穷,备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寻求一条强国富民的出路,绝非一介为学术而学术的教授学者,而其论著覆盖面之广,在我国殊不多见。应特别提出的是,他是我国《文化学》的开创者,是在大学(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将《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讲授课的第一人,其所著《文化学系统》(有的地方称为《文化论丛》),共20册,每册约10万言,其中1-4册《文化学概论》是我国这门学科的开山之作。

先生的学术研究可分两个时期,前期至1949年建国时止,在这一时期,他本“人格独立学术自由”之精神进行研究,著述丰硕,并曾就中国文化问题、乡村建设问题及教育问题,在全国引发了三场争论,而文化问题的争论,影响尤为深远。三场争论的实质,归根结蒂是一个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争论的对手是强大的,或为以国民党政权为后盾的所谓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陶为蒋介石抗战胜利前夕所著《中国的命运》的代笔者)等十教授,以及直接站在政治前台的陈立夫、吴铁城等,也有打着“唯物史观”旗号的“左派”人士;或为誉满全国的文化名流如梁漱溟、张东荪、张君勱等,胡适虽是“西化”论的支持者,但在教育问题的争论中却是先生的对手。总之,大义所在,真理所在,先生常置毁誉于不顾,敢为天下先,尤其是一直坚持未为多数人理解或接受的“全盘西化”论,这种无所畏惧精神,令人不由得想起民族先哲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那副著名楹联。建国后,先生进入学术研究的后一时期,由于“全盘西化”论,深受误解,其学术研究转向东南亚古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史,逝世前已完成《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计达百余万言,另有遗作《匈奴史稿》由南开大学延聘专家整

理出版。这九种著作分别填补了我国史学研究的空白。联想到他处于政治逆境的 60 年代初,拒绝了赴新加坡任南洋大学校长之聘,更令人深深感到:先生的一生是无愧于国家与人民的一生,奉献的一生。

非西化无以实现现代化。这是由十八、十九世纪英、美、法、德等诸国已成为产业革命的先行者这一历史现实所决定,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中国的“西化”自“洋务运动”算起至先生“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这六七十年间,中经“民国”的改朝换代,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现代产业,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诸方面也有了一定进步,但比之欧美,其距离之大,仍难以道里计;西化效果也无法与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相比。究其主要原因乃在意识形态的滞后,只将“西化”作为“师夷之技”仍坚持以“中学为体”,在饱受“船坚炮利”的列强欺负之后,仍认为“列强”所优者仅为物质技术,而包括“三纲五常”在内的传统精神文明即中国的“固有文化”依然远胜于西方,并以此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1933 年在中央以至地方当局都在提倡“尊孔读经”背景下,先生以《中国文化之出路》为题对业已桎梏着生产力发展的腐朽意识形态,发起了无畏的进攻,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寻求中国现代化的出路中,先生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文化整体提了出来,抓住了中国现代化迟迟未能实现的要害,矛头所指,首先是坚持保存固有文化的“复古派”。“全盘”二字按先生原意,着眼的是“西化”的彻底性,而非指百分之百。他在《全盘西化论》稿中指出:“全盘”这两个字,可当作弹性解释,也可当作硬性解释。他还作过类似举例:标为 $\times \times$ 全体合照的,未必为 100% 的全体。从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应说是振聋发聩的一声春雷。

先生的“全盘西化”并无任何政治制度的标签,既指欧美,也将苏联包括在内,他虽不用先进生产力这一类字眼,其意实指,凡其生产力先进者,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中国都应吸之、纳之、而后赶

之、超之,这层意思是先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的。当时对“全盘西化”的误解或质疑,一是给它涂上政治颜色或把“西化”作为“资本主义”化,或“怕全盘西化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或“民主化”。^[2]但更多群众的误解,恐怕是出于还未细读文章,便望题生义,以为先生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一概否定的态度,遂讥之为“数典忘宗”;或读了先生的文章,见其所列举的方方面面(包括衣食住行)尽是不如西方的事例,便认为先生所见,连月亮都是西方的圆,不自觉地产生了抗拒情绪,甚至发生了一些在今天看来纯属不必要的烦琐争论。须知先生的“全盘西化”其指向是将“腐朽”作为“优越”的“复古派”旁及“折衷派”,是为了清除与物质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思想障碍,自不能将可“传承”者作为其论据(其实,笔者以为“传承”也只应是改造传承),即使有过激之处,也如“五四”当年,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一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在二十余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在进入“全方位”开放的关键时刻,也出现过来自意识形态的障碍。即所谓“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有些人一定要将解放生产力的措施贴上社会制度的标签,只是在小平同志“不搞争论”、“大胆闯”、“大胆试”的英明决策下,混乱思想才得以及时澄清,否则,要取得今天这样的建设成就是绝不可能的。由此可以想见,先生作为一介书生,当年提出了与当局统治思想完全相左(且还有不少好心的误解者)的“全盘西化”论要具有何等的胆识与魄力。

此外,先生的许许多多学术主张至今还有值得参照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文化的定义的界定

就笔者查阅所及,一般词典(包括《辞海》)对文化一般界定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先生的界定是“文化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工具和结果”,前一